

# “现代新闻记者”的困境：柯尔律治新闻写作述评<sup>\*</sup>

孙凌钰

**摘要：**柯尔律治作为最早的“现代新闻记者”之一，承受了时代变化带来的精神和经济双重压力。不少学者批评他的新闻写作表现出立场骑墙和太遵循时效性，但我们必须看到，这并不能仅仅归因于他本人缺乏政治思想，而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理解他。他最终离开报社，专注于哲学散文的写作，也是因为他认识到新闻并不能开启自由舆论空间，并且开始反思新闻写作的作用。

**关键词：**柯尔律治 新闻写作 立场骑墙 时效性

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作为新闻和期刊写作者的形象，一直被他作为浪漫主义诗人和文学理论家的身份所遮蔽。事实上，他的新闻、期刊写作贯穿他一生，甚至我们从他的诗歌作品中看到，很多诗歌作品是率先发表在杂志上的。他从1797年至1803年是新闻、期刊写作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柯尔律治有规律地为伦敦两家日报写作，是报社写作社评的最重要的作家。1803年以后，他逐渐淡出新闻界，作品多为哲学、宗教等思想领域的散文。玛丽琳·巴特勒、安吉拉·埃斯特海默等学者认为新闻、期刊写作这些文化活动，而不是某篇文学作品，对奠定他在文学、文化历史中的地位是决定性的，他是“现代新闻记者”的最早典型，是浪漫主义时期思想革新的代表之一。然而，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特的姿态”却往往被人忽略，在他死后的

<sup>\*</sup> 本文为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培育项目“英国浪漫主义与18世纪政治哲学思潮之关系”（项目编号：CUCISA14）的阶段性成果。

漫长的 19 世纪，不但鲜有评论家称赞或研究他的新闻写作，还因为他早年的政治立场不统一为他招致许多批评。一直到 20 世纪才陆续有评论家关注他这部分创作，将之视为理解他本人和他的时代的重要材料。这篇文章试图解释他的新闻写作活动与其时代的重要联系，解释他最终放弃新闻写作而转向“晦涩难懂”的散文写作的原因。

## 一、“骑墙者”还是“现代新闻记者”？

1797 年 11 月，柯尔律治受出版人丹尼尔·斯图亚特（Daniel Stuart）<sup>①</sup>之邀，旅居伦敦为最重要的日报之一《晨邮报》（*Morning Post*）写作社论。他在这一时期的社论文章中讨论法国宪法、拿破仑的军人独裁等问题，紧跟国际大事做出评论，使《晨邮报》的政治评论在众多报刊中显得鹤立鸡群，为《晨邮报》赢得了一批为数不小的读者<sup>②</sup>。1803 年，斯图亚特卖掉《晨邮报》，带着柯尔律治进入另一家晚报《信使》（*Courier*），柯尔律治继续担任主笔。柯尔律治对这两家报纸均做出巨大的贡献，为报纸带来巨大销量。正如斯图亚特称赞柯尔律治：“柯尔律治写作新闻头版时评的能力超过麦金托什（Mackintosh）、伯克（Burke）和其他人。他的观察力不仅来源于他出色的感觉，也来自他丰富的知识、深刻的思想和卓越的预见能力，他同时以学者、绅士和政治家的身份在写作。”<sup>③</sup>虽然得到老板的赏识，但是柯尔律治早期的新闻写作并没有给他带来真正的声誉，还让他招致许多研究者的批评。19 世纪，研究者更多地关注他后期散文的内容

① 丹尼尔·斯图亚特是当时伦敦著名的新闻出版人，被称为英国 19 世纪初最伟大的三位报人之一。

② 《晨邮报》每天（除周日）有 4 页版面，内容包括种类多样的商业、学术和社会新闻。第一页罗列当晚伦敦剧院的演出信息，以及房地产、新产品、书，或找工作的各种广告。第二、三页和部分第四页，是国内、国外事件的评论文章，原创诗歌，戏剧、音乐会、讲座和其他表演的评论，社会新闻，邮轮新闻，犯罪新闻、破产、出生、死亡、结婚告示。商业性内容在第一、四页，在报纸外层。第二页的内容，通常叫头条（leading paragraph），是吸引读者最关键的内容。而《晨邮报》和《信使》的头条文章，基本都是柯尔律治所写。

③ Erdman David, ed. *Essays on His Times*, vol.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lxvii.

和风格<sup>①</sup>，尚未关注他早期的新闻写作；到了20世纪，随着他的早期散文集《他的时代的散文》（*Essays On His Times*）出版，他的新闻作品集中展现在世人面前，终于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学界对他的第一种质疑是认为他毫无长远的政治思考，称不上政治思想家。《他的时代的散文》（*Essays on His Times*）的编订者额德曼（Erdman）评价柯尔律治在《晨邮报》的数年间是一个政治狂热者，而不是一个政治思想家，“他没有一个稳定的党派立场，也没有对政治长远的思考”<sup>②</sup>，认为柯尔律治还是在朱尼乌斯（Junius）<sup>③</sup>的传统里写作新闻时评，关注的不是长期目标，而是当下事件，追求精确和新鲜。比如书中记录《晨邮报》1802年9月25日的文章，柯尔律治表达对法国形而上学哲学的批评，认为形而上学不是政治的方法，法国人会为此付出代价。1802年10月5日和9日的文章中，柯尔律治在斯图亚特和麦金托什的要求下，向所有党派的人说话，呼吁国人看到保王党人的良苦用心，并且明确提倡国家荣誉感和世袭贵族制，认为拿破仑政府的和平希望已彻底熄灭。10月8日的文章中支持皮特政府再次

① 对柯尔律治后期散文的讨论，详见拙文《柯尔律治的散文风格与真理的传播——以〈朋友〉文本为中心》，载《枣庄学院学报》，2013年12月，第41—47页。19世纪早期和中期学界对柯尔律治散文的评价，如Gordon Mckenzie认为柯氏的作品显示了缺乏有秩序的计划规划和发展，风格繁冗、经常离题。William Walsh认为柯氏的散文计划混乱。D. G. James认为他很少把事情想透彻，他的散文风格不能再差劲。这些人的评价有继承前代批评的看法，也有采用柯尔律治自己的说法。柯尔律治在文章中有四次明确的批评自己的文风，用词是晦涩、缠绕、过度阐释。Henry Nelson认为柯尔律治文风平实、直接，但有时会离题很远，对读者思想要求很高。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学者反对主流意见，认为柯尔律治的风格不是松散（loose），而是紧凑有控制。到20世纪中后期，学者进一步挖掘其散文风格的价值，如Stephen Potter认为语句的复杂是为了思想的清晰，如果他用词太简单，会相应地把思想简单化。这些论述均参见Grow, M. L., *The Prose Style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此文为博士论文，藏于国图缩微阅览室。

② Erdman, David, ed., *Essays on His Times*, vol.1, p.lxi.

③ 一位时政作者的笔名，据后人考证是英国政治家菲利普·弗朗斯希爵士。朱尼乌斯于1769—1772年在伦敦的报纸《公共广告人》（*Public Advertiser*）上抨击内阁，风格是发表对当下政治的评论，而不建立理论系统。他连载的批评文章讽刺国王、抨击议会、蔑视法庭，言辞十分大胆，使《公共广告人》的销量从2800份一举飙升至5000份。可想而知，朱尼乌斯在当时有多受新闻业界老板的喜爱，可对议会和政府来说，他却是十分头疼的对象。

组阁。10月14日再次发表他早年写的诗歌《转变》（*Recantation*），以新题《法国》（*France*）发表，表达对法国政治的失望。这些文章虽都表达统一的保守主义立场，但仍然是围绕时事发声，并无长远而严密的理论体系可循。

学界对他的第二种质疑是认为他政治立场骑墙。柯尔律治在《晨邮报》时期曾经历了政治思想的大转变。他早年思想激进，推崇葛德文、潘恩等思想家，认为人能被当下环境立竿见影地塑造和改变，而不需要依靠漫长的历史和习俗的熏陶来培养。因此他不赞同柏克所持的重视传统、维护习俗的权威等观点，也不认同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在当时的柯尔律治眼里，法国大革命象征着整个欧洲打破封建统治的希望，拿破仑的政治能力则象征着他理想中的哲学王。但当他和骚赛在现实世界中创造“大同世界”的理想彻底破灭之后<sup>①</sup>，他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和自省，在这段时期他不仅反思法国形而上学的革命思想在现实政治中的效用问题，也更深刻地反思了“人”是否能离开传统和习俗而被养成的问题。柏克在《法国革命论》中所提出的尊重英国传统宪制、尊重英国习俗、警惕法国式的历史断裂等问题，在柯尔律治头脑中逐渐得到认同，而这个过程一直伴随着他的新闻写作。1798年，法国入侵瑞士和西班牙后，柯尔律治发表诗作《转变》（*Recantation*）表明自己的立场转变，随后的作品也转向对法国侵略行为的强烈批判。与此同时，柯尔律治对国内政治的态度也发生变化，从以前坚决反对小皮特政府的政策，转变为支持小皮特政府的对法战争，也支持延续小皮特政策的阿丁顿政府。

许多现代批评家试图从他的新闻写作中找到他确定的政治立场，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柯尔律治早期缺乏激进或保守立场的选择，不像后来，他是一个明确的保守主义者。只有柯尔律治的传记作者霍姆

---

① Beeley Harold,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Coleridge", *Coleridge, Studies by Several Hands on the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Edmund Blunden & Earl Leslie Griggs, ed. (London: Constable & Co.LTD, 1934), p.153.

斯 (Richard Holmes) 认为柯尔律治在《晨邮报》期间表达了一种新的成熟和清醒的观点, 认为他为报纸形成了一种新的、适度的、有限的姿态, 通过打击狂热分子和极端主义, 呼唤“创造一种适度的、中正的自由观点”<sup>①</sup>。其他学者均对柯尔律治的新闻写作评价很低, 如汤普森 (E.P.Thompson) 在 1979 年一篇评论文章里说, 柯尔律治是“知识分子变节者的代表”、“这些文章, 既不负责任也没有道德感, 而且写得也非常差”<sup>②</sup>。艾伦·刘 (Alan Liu) 认为, 柯尔律治的政治文章立场摇摆, 充满机会主义, 他说“晨邮报时期柯尔律治的写作最出色的是他的修辞”<sup>③</sup>。克里斯特森 (Christensen) 写道: “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 柯尔律治总是有点远离政治, 既不是雅各宾派革命者, 又不是伯克妥协者, 他就是一个骑墙者。”<sup>④</sup> 这种批评似乎没有考虑柯尔律治所处的环境, 以纯粹的学术标准要求他, 而没有追问他立场骑墙的原因何在。

但仍然有一些学者, 不再纠缠柯尔律治早期的政治立场的对错, 而是关注他早年如此表现的原因是什么? 柯尔律治是新时代兴起的“现代新闻记者”, 承担着时代变化而产生的精神、生活压力。现代新闻记者并不是传统的忠诚的党派成员, 而是需要吸引广大读者、要靠自己养家糊口的职业作者。他的“机会主义”, 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报纸的党派属性和市场销量等因素的绑架。我们将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入手, 尝试来同情地理解他。

## 二、时代浪潮中艰难的“现代新闻记者”

柯尔律治在《晨邮报》发表过几篇评论法国宪法的文章, 后来

① Holmes Richard, *Coleridge: Early Visions*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89), p. 255.

② Thompson E. P., “A compendium of cliché: the poet as essayist”, *The Romantics: England in a Revolutionary Age* (New York: New Press, 1997), pp. 149-152.

③ Liu Alan, *Wordsworth: The Sense of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425.

④ Christensen Jerome, “Once an apostate always an apostate”, *Studies in Romanticism* 21, p. 464.

被额德曼整理在一起，以《论法国宪法 I—IV》（“On the French Constitution I—IV”）为题收入散文集。这样编纂以后，我们在阅读时会有意识寻找几篇之间连贯的主题，一旦发现柯尔律治行文重复甚至前后观点不一致，便大失所望，批评柯尔律治的立场不稳定，甚至怀疑他基本的写作能力。但我们应该清醒地知道，这种对关联性的诉求是编者暗示给我们的，而非柯尔律治的本意。柯尔律治在报纸上发表有关法国宪法的评论，他并没有计划写几篇，其实也根本无从计划，只能是随着时局的变动而写，如果忘掉了这个背景，而用传统看待学者论文的态度去看柯尔律治的新闻写作，便很容易对他的能力做出误判。因此，了解柯尔律治早期所处的政治环境以及刚刚兴起的新闻业的特点，对于帮助我们理解他的新闻作品十分必要。

18 世纪末，由于人们对法国大革命和战争的关注，伦敦的日报生意非常好，日报数量从 1783 年的 9 家，发展到 1790 年的 14 家，到 1792 年已有 16 家。1799 年，《晨邮报》的发行量大约是 2000 份，斯图亚特说当他 1803 年把《晨邮报》卖掉，发行量已达到每天 4500 份，但这个数字也不能估计实际的读者数量，因为读者往往是报纸数量的 10 倍，他们在咖啡馆共享同一份报纸<sup>①</sup>。新闻行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主要的政治党派都意识到报纸在传输政策给大众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学者艾斯皮诺（Arthur Aspinall）和沃克梅斯特（Lucyle Werkmeister）都指出，在 18 世纪末，“公众（public）”这个词实际上等同于“新闻报纸读者”这个词<sup>②</sup>。在这种形势下，最有力的武器当然是党派开办自己的报纸，比如 1792 年至 1793 年，政府开办《太阳报》（*Sun*）和《真英国人》（*True Briton*），来直接掌控舆论走向。其次是各政党都想尽办法收买报纸，为己所用。有些是直接的现金交易，比如《晨报编年史》的老板詹姆斯·佩里（James Perry）接受首相福克斯（Fox）

① Hessel, Nicola Anne, *Coleridge as Journalist, 1799–1800* (Canada: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anada, 2003), p. 44.

② Ibid., p. 45.



的现金。斯图亚特虽然宣称自己没有收任何官员的钱，但是也不能说明报纸没有收党派的钱。通过买报纸广告版面的方式，使党派向报纸付钱的事变成合法的<sup>①</sup>。柯尔律治所在的《晨邮报》接受托利党津贴，后转入的《信使》又接受阿丁顿政府的津贴，都是几成定论的事实，因此我们看到柯尔律治对皮特政府的态度前后不一，遭人诟病。然而，受雇于人只能配合报刊的政党立场来发声，这种政治压力不是文人个人能够消解的。

在承受党派压力的同时，政府的书报审查制度也很严酷。虽然英国在1774年废除了永久版权法，结束出版界寡头垄断的局面，让一大批出版商和印刷商获得了自由，但是书籍出版以后要接受政府的严格审查，如果书中有反政府等言论，作者将会受到严厉的刑罚。可想而知，柯尔律治也在审查制度下如履薄冰，比如他一边主张保护人权，反对政府“控制言论自由”的法令，另一边又在另一篇文章中赞成政府反对“煽动性作家”的政治智慧，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sup>②</sup>。这些看似反复无常的立场，如果仅仅归因于柯尔律治的浪漫主义诗人特性，或者简单指责他立场骑墙，都显得过于草率。毕竟没有人能孤立于时代，每个人都受到社会政治条件的许多制约。学者汤普森曾对柯尔律治表示理解，因为他发现柯尔律治某些言论自相矛盾，可能是被政府的审查制度左右的，目的是试图避免被起诉<sup>③</sup>。可能这也是柯尔律治屡次表示自己的新闻生涯非常辛苦的原因之一<sup>④</sup>。

除了政治制度的大环境，柯尔律治还需恪守新闻行业的时效性（temporality）的原则。所谓“时效性”，就是写作新闻、期刊文章要

① See Hessel, Nicola Anne, *Coleridge as Journalist, 1799–1800*, p. 47.

② See Patton Lewis, ed., *The Watchm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343.

③ See Thompson E. P. “A compendium of cliché: the poet as essayist”, *The Romantics: England in a Revolutionary Age*, p. 153.

④ 关于柯尔律治抱怨记者工作太累的记载，参见 Griggs, Earl Leslie, ed.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1.1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56), p. 569。另参见 Esterhammer, Angela, “Coleridge in the newspaper, periodicals, and annual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Online publication date: Dec 2012: 13。

紧跟时事热点，并且需在相应的时间限制之内完成写作。不像其他沉思性的文章可以让作者深思熟虑、反复修改，新闻期刊作品往往是一蹴而就的，往往是灵光乍现的。学者扎查瑞（Zachary）分析过柯尔律治的两种写作方式：即时写作和哲学写作，并认为他同时擅长用这两种方法写作，比如他的诗歌就是他深思熟虑的产物，而每天的新闻写作，则追求效率。柯尔律治有一种能力，即能在有限时间内表达观点，所以他有很多文章的观点就是在跟斯图亚特聊天时直接讲出来的，当晚就拿去印刷。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描述自己必须随时把想法记录下来，因为每天写评论需要这些灵感<sup>①</sup>。对事件的快速分析能力以及卓越的语言表达能力，使柯尔律治能胜任新闻记者的工作，并获得一种成就感。但这种写作方式使柯尔律治始终挣扎在“最后期限”上，这种追求时效的急迫性使他没有时间来反复思考自己的观点。

很多时候，这种“时效性”会被新消息的延误所困扰，今天的新闻还没有到，报纸却等着付印，编辑便不得不把旧消息重新说一遍。柯尔律治也常遭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迫，他只好把自己的诗歌换个题目重新发表，或者把前几天的文章改头换面重新发一遍。同时，报纸还要用一些技巧激起读者的预期和悬念，好让他们继续买下一期。《晨邮报》里的报道常常“未完待续”，为了刺激你买下一期，可在真正下一期内容刊登之前，中间还夹杂很多期无关紧要的内容。当这些文章被集合在一起呈现出来时，我们很轻易就看出它们中间前后重复甚至前后矛盾的内容，但只有我们真正回到柯尔律治创作的环境里去，才能体会他作为第一批新闻记者所处的困境。

虽说报社有时会使用这些营销策略，但也不能太过放肆，报社还是需要迎合读者的兴趣，来保证销量和经济效益。我们从柯尔律治和斯图亚特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他们在商量选题时，经常提到英国的早餐桌和咖啡馆，柯尔律治在信中明确说：“我们要注意早餐桌旁和咖

---

<sup>①</sup> See Griggs, Earl Leslie, ed.,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1, p. 365.



咖啡馆里的绅士们的兴趣点和口味。如果我这几篇文章不能符合咖啡馆绅士们的兴趣和口味，那么宁愿不发表我的文章。”<sup>①</sup> 这是非常现实的考虑，18世纪末的英国，咖啡馆成为人们交换新闻的绝佳场所。首先是因为中产阶级的文化程度大幅提高，阅读报刊已成为他们的重要休闲方式；其次是因为18世纪末的英国政府对新闻出版物的严格管控，使人们很难用低廉的价格从非法出版物上获得信息，也很难消费得起昂贵的“新闻信”<sup>②</sup>。这时人们发现聚集在咖啡馆里分享信息是一个绝佳的选择，信差经常把报纸和小册子投递到咖啡馆，常常几十人分享同一份报纸。

柯尔律治为了吸引咖啡馆读者，通常需要摆出与读者一致的政治态度。比如，当小皮特政府在欧洲组织反法联盟时，柯尔律治坚定地反对皮特政府，反对战争。而在1801年皮特政府倒台以后，柯尔律治马上转变为支持阿丁顿政府。事实上，阿丁顿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延续皮特政府的主张，只是阿丁顿政府言辞较为温和，在当时获得了人们的支持。那么，柯尔律治对阿丁顿政府的支持很有可能是出于经营策略的考虑。人们期待新政府有所作为，若报纸在此时依然大肆唱衰政府，恐怕并不明智。

柯尔律治的老板斯图亚特对此也高度警觉，他曾拒绝一篇托马斯·普尔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批评咖啡馆男性服务员的，认为“男性侵占和压缩了女性的就业空间”。斯图亚特拒绝它的理由是，第一，在《晨邮报》的消费者中，活跃的餐厅、咖啡馆服务员群体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第二，服务员对报纸购买量的影响力非常巨大。至少他们的敌意会非常危险，因为很少有家庭直接购买一份没有经过服务员阅读的报纸<sup>③</sup>。由此可见，新闻期刊是读者导向型的写作。柯尔律治的新

① Griggs, Earl Leslie, ed.,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1, p. 627.

② 贵族阶层依靠直接从海外邮寄回来的“新闻信”获取信息，但新闻信因其价格昂贵，只能满足贵族阶层的新闻需求，大多数英国人无法承受。

③ See Erdman, David, ed. *Essays on His Times*, vol.3, p. 165.

闻写作成为依赖时局、读者导向型的写作，在其中失去主体性地位，多少有些尴尬。

### 三、“现代新闻记者”理想的陷落

1803年以后，柯尔律治与《信使》仅保持若即若离的联系，将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哲学研究和写作中。他本人对自己前几年的新闻写作生涯评价较低，也有不少学者把柯尔律治早年参加新闻写作归因于他生活的贫困<sup>①</sup>。我们承认经济当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他1803年的离开报社并非是因为经济问题解决了，而是因为他原初的新闻理想破灭了。因此经济等实用主义的原因并不是他参加新闻写作的充要条件，柯尔律治的思想中还有更纯粹的形而上学面向，他在18世纪末对新闻怀有美好希冀，相信新闻能开启理性的公共空间，能对英国政治起积极作用。

他早在1795年的公开演讲中说“出版社之间的交流像长了翅膀”、“新闻是最大的指挥者，让令人震惊的真相传遍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sup>②</sup>。他敏锐地感到新兴的新闻业的巨大作用，可以把信息传播给大众，也能让大众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中来。出于想做一个国家医生的热忱<sup>③</sup>，柯尔律治在1796年就加入伦敦《电报》（*Telegraph*）杂志；他在名义上接受詹姆斯·佩里（James Perry）的邀请，成为《晨报编年史》

① 很多学者认为他做新闻记者只是为了钱，如Thompson认为，柯尔律治让自己被无道德原则的报纸主编“使用”，他允许自己这样被使用，全部因为他需要钱。参见Thompson, E. P., “A compendium of cliché: the poet as essayist”, *The Romantics: England in a Revolutionary Age*, p. 153。又如，柯尔律治把《古舟子咏》以5镑价格卖给《每月杂志》（*Monthly Magazine*），为了赚钱去威尔士旅行。See Esterhammer, Angela, “Coleridge in the newspaper, periodicals, and annual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Online publication date: Dec 2012: 3.

②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Lectures 1795: On Politics and Religion*, Lewis Patton and Peter Mann, e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313.

③ 柯尔律治曾自白：“一个正常人应把日常精力用到个人事务上，如果把过多的希望或恐惧给那些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是一种疾病。可我恰恰就患有这一疾病。”这种疾病是什么？就是不顾个人损失而花费大量精力去关心社会公共事务的热情，柯尔律治试图用写作时政评论的方式来作“国家医生”。See Erdman, David, ed. *Essays on His Times*, vol.1, p. lxii.

的合作编辑。

同一年，他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守望者》(*The Watchman*)，他在《守望者》序言中说：“这（创办《守望者》）对于爱好自由、理性和人性的朋友来说是一项紧急的任务”<sup>①</sup>，意为他希望通过期刊杂志建构一个理性空间，提供给人们互相交流、甚至互相争论的公共空间。于是，柯尔律治设计了一个实验，通过开放专栏的方式，邀请读者投稿，用“互相推进（mutual propulsions）”的做法，作者和读者一起讨论社会问题。他在《守望者》创刊辞中对读者说：“邀请我的读者就民主和公共事务写作投稿，把杂志当成一间宽敞的咖啡馆。”<sup>②</sup>即便在今天看来，这也是一个具有创造性、十分具有现代性的做法。哈贝马斯的理论认为，公共领域是指一个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民众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干涉。新闻期刊的出现，似乎是民众获得公共空间的希望。早年笛福创办期刊的工作得到过哈贝马斯的称赞<sup>③</sup>，而柯尔律治的做法比笛福更具有先锋性和实验性，他不是把民众当作被启蒙的对象，而是直接邀请他们成为交流的主体。但是，柯尔律治忽略了他面对的民众的心智水平，这个实验很快就停止了，因为柯尔律治满腔热情得不到读者的回应，一些知识分子觉得他的文章不够严谨，而水平稍低的读者则看不懂他的文章，无法与他对谈。柯尔律治最终对他的读者失去耐心，停办了《守望者》，第一次努力以失败告终。

柯尔律治的第二次尝试是在《晨邮报》时期。柯尔律治认为由新闻行业开创的舆论空间，是获得自由讨论的渠道，这种自由交流的空间的存在，才能保证民意有宣泄的出口，才能保证政府不遭受民众的

① Qtd. in Coleman, Deirdre, “The journalist”,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oleridge*, Lucy Newlyn,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9.

②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The Watchman*, Lewis Patton, ed., p. 5.

③ 哈贝马斯说：“笛福为建立英国的新闻事业尽过很多力，他在报刊《评论报》上奠定了18世纪撰写期刊文章的工作。这项工作斯蒂尔和艾迪生手上得到发展，他们一道创办了《闲谈者》和《旁观者》，风俗、时尚、文学、故事、道德见解都先后成为短文的题材，这些短文是有意识地写给中产阶级读者的。”哈贝马斯认为这些杂志、报刊是培养批判意识的公共阵地。参见〔英〕艾弗·埃文斯：《英国文学简史》，蔡文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58—359页。

非理性冲击等政治危机。换言之，良性的公共空间的交流能消解民众的不良情绪，能保护英国的国家稳定。当时许多政治人物也认识到新闻的积极作用，正如首相福克斯所说：“新闻大战总比军队战争好，让那些报纸去吵吧！”<sup>①</sup>

当时《晨邮报》的出版人斯图亚特明确表示希望能在报纸上开辟政党间理性交流的空间，开启真正清明的政治。他说：

如果我们不按对错来判断，而仅仅根据大众的接受程度来精明的计算，那么是不真诚的。如果我们提出确定的原则，符合理性的、可实践的，看事情或人物是否符合原则来做评判，这也是相当难的。尤其是我们还要考虑到公众的信心和希望，这才是真正的无党派性。实际上，党派作家之间的争论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这其中的危险在于，两党互相间的失望和仇恨，往往会使他们彼此诽谤，以致丧失公众对他们的信心和信任。<sup>②</sup>

他把《晨邮报》的政治立场不稳定解释为“无党派性”，其目的是开启党派之间良性的争论，这种争论是有益于政治的。柯尔律治也支持这一观点，他认为如果报社要服务政治，那就不应片面支持某一党派，而应努力开启一个让双方自由、有效交流的空间，通过双方的辩论来找到一个利益平衡点。但是，这一理想也很快破灭，因为政治的高压和生存压力，报社不得不变相接受党派津贴，新闻记者在当时无法独善其身。

1803年以后，柯尔律治就只与报社维持微弱的联系，开始专注于更哲学化、更内向化的哲学和宗教问题思考中，用一种高深莫测的、晦涩难懂的语言向受过教育的中高阶层的人们说话，从1809年起陆续创作了《朋友》（1809—1810）、《俗人的布道》（1816—1817）、《文

<sup>①</sup> Erdman, David, ed., *Essays on His Times*, vol.1, p. cxi.

<sup>②</sup> Ibid., p. xciii.

学传记》（1817）、《沉思之助》（1825）等著作，这些作品真正对舆论造成了影响，也被玛里琳·巴特勒认为是柯尔律治“一生中真正有意义或至少是有影响的工作”<sup>①</sup>。可以说，柯尔律治在有生之年及死后享有的盛名，多半是依靠他中晚期的这些作品赢得，而不是依靠早期发表在报纸上的社评以及年轻时创办的杂志。

这段时期，柯尔律治越来越不掩饰自己对早年那段新闻写作生涯的否定，也公开宣称自己要为“有身份、有财产、有社会地位、有才华或喜欢思考的人，为那些能影响大众的人”写作。早年希望开启理性交流的公共空间的梦想，已被无望的现实砸醒，他发现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思维是时间性的，只能按时间顺序重现事物，而没有抽象分析能力，但受过教育的人的思维是空间性的，不仅能提炼主题、能结构性地组织句子、还能抽象地分析事物之间的联系，而理性交流恰恰需要这样的抽象思维。他开始相信交流只能在上层社会中发生，只能跟受过教育的人分享思想。玛里琳·巴特勒说：“（后期的）柯尔律治有意用他的文体来发现一个精英阶层，并改造它，使之更符合自己的理想。他的写作风格为他赢得拥护者，那奇怪的专业化语气仿佛与读者签订了一种契约，把读者上升为上帝的选民之一，使他满心欢喜。”<sup>②</sup>这段评语可谓非常贴切，他后期散文诘屈聱牙的风格，可以说是他对读者的主动选择，也是他对读者主动的思维训练的教育。至此，柯尔律治已不再是早年激进的“现代新闻记者”，而是主动选择了保守主义思想立场，继续自己的思想启蒙之路。

#### 四、放弃新闻写作的深层原因

经过了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柯尔律治的新闻实践在遭到政治环境

---

① [英]玛里琳·巴特勒：《浪漫派、叛逆者及反动派》，黄梅、陆建德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0页。

② 同上书，第145页。

的种种限制以及他对读者群体的失望后戛然而止，这可算是他放弃新闻写作的表层原因。笔者认为，柯尔律治放弃新闻写作还有一个深层原因值得关注，即他对政治本质的透彻分析反而使他的新闻实践蒙上一丝形而上学的色彩，从而与现实条件格格不入，最终不得不放弃新闻写作。

柯尔律治对政治有一个基本判断，即政治不属于形而上学的领域，因而不可能仅凭理性就解决所有政治问题。理性只是人类的一种能力，并不能以偏概全。以政治为例，政治是经验世界的事务，要依靠久经考验的传统和习俗来支持，要依靠人们在习俗和传统中获得的智慧来谨慎地处理，绝不是可以由理性思维一蹴而就的。柯尔律治反对法国革命的原因也在于此，他认为法国人误把政治当作几何问题，想用精确的定义和原则来处理现实政治，这必然要失败的。现实世界中并没有任何一种固定原则可以永恒不变地用于政治事务，我们只能顺应它不停变化的规律，来审慎地作出反应。

这样的认识可谓道尽保守主义的精髓，不盲目崇拜理性和普遍性。然而，柯尔律治在与政治相关的新闻实践中，却试图在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中追求一种永恒的普遍性。他曾在《文学传记》中回顾自己的新闻写作生涯，认为自己当时并不是立场骑墙，而是遵循一个普遍原则。后来柯尔律治的女儿萨拉（Sara Coleridge）把这一普遍原则解释为“道德立场一致性（Virtual Consistency）”，认为他的文章都与英国重要的历史时期有联系，因而观点也有了普遍原则<sup>①</sup>。换言之，柯尔律治所说的普遍原则与历史、习俗联系在一起，指的是久经历史考验的道德一致性，而不是固定的、成文的理性准则。更准确地说，柯尔律治认为虽然经验世界中的事务没有理性原则可循，但依然可以依靠经验和审慎，来寻找和遵循其道德原则。额德曼赞同这种解释，他说：“这种普遍原则从来没有明确出现，因为政治的原则最终表现为没有

---

<sup>①</sup> See Erdman, David, ed., *Essays on His Times*, vol.1, p. lxiv.



原则，只能采取权宜之计。权宜之计是柯尔律治从柏克那借用的语言，听上去像是有机会主义、见风使舵等贬义，但事实上并不是。”<sup>①</sup>正因为经验世界中政治原则最终表现为没有原则，所以不可能希望用固定原则来统摄一切，而要灵活多变。同理，与政治相应的新闻写作领域，柯尔律治所说的普遍原则也不是几何学意义上的理性原则，而是在道德原则的观照下，随事件变化做出及时的调整 and 改变。

柯尔律治以此来解释他的新闻写作为何显得没有原则，因为与政治相关的新闻评论，本来就没有一个固定原则可循，一切都要在当下根据道德律令来作出判断。这种态度看似考虑了经验世界的特点，实则却有着非常理性的坚持。这种理性并非法国革命坚持的理性，而是高于人类理性计算能力的一种直觉判断。虽然对这种理性能力的要求，非常不符合现实，但柯尔律治还是用远远高出读者或政客能力的理性，来指导自己的新闻实践，试图坚持与党派保持距离的客观态度，试图指导读者理性地思考当下政治。因此他也从来没有成功过，柯尔律治终于在党派压力和读者能力不足面前，缴械投降。而他失败的真正原因，恰在于他太过坚持自己认为的更高级的理性原则。

然而，柯尔律治虽然失败了，但是他在新闻实践中表达的对政治的理解、对理性直觉的理解以及对新闻功用的理解，却是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财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柯尔律治的新闻写作有着别具一格的价值。

---

<sup>①</sup> See Erdman, David, ed., *Essays on His Times*, vol.1, p. lxiv.